

新闻学 广播集 新广论

王珏 著

新闻广播学论集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肖 月

封面设计：孟力力

新闻广播学论集

王 珏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北京怀柔黄坎印刷厂印刷

ISBN 7-81004-142-8/G44

787×1092毫米1/32 11.5印张 250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元

前 言

——纪录·积累·开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实现伟大历史转变过程中，思想解放的潮流和新闻改革的实践，推动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和新闻学术研究工作进入一个繁荣和发展的新时期。从1980年开始，我陆续在《新闻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新闻广播电视研究》、《新闻战士》、《新闻知识》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科自学大全》等业务理论书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在一些热心的同志催促下，现挑选了其中的27篇，加上1982年暑假我在辽宁省广播事业局举办的编采人员训练班上讲授新闻理论的提纲、1985年10月随北京广播学院访日代表团考察日本新闻广播电视教育的纪实报告和《中国广播电视年鉴》首届、二届年会上的发言，汇编成册，为新闻广播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提供一本参考书。这些文字都是围绕新闻广播电视理论问题展开的，就连访日考察报告，也没有东邻风光的描写，而是着重对日本大学和上智大学的教育思想、办校方针、招生制度、课程设置、

教学管理、教学方法和新技术运用的考察。因此，取名《新闻广播学论集》，按照文章发表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纪录、积累、开拓，这6个字可以概括编印这本书的主旨。其中有些文字，是我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著述、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摆脱旧传统观念束缚的纪录，是参加新闻界学术讨论的思想纪录。讨论问题时发表的意见总是有针对性的，但学术争鸣，只奔向真理，对事不对人。为尊重历史，对收入本书的文章，只作个别文字订正，内容和提法均保持原貌。

新闻学是一门年轻的、正在建设中的新学科。它在思想资料和研究成果的积累、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概括、理论观点的提炼和学科体系的系统化等方面都有大量艰苦工作要做。这本小书也可算作在新闻理论研究方面一点思想资料的积累。

从1985年秋开始，领导让我参与《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部的组织领导工作。这给我一个机遇，能够接触来自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大量丰富的资料，使我深感新闻理论建设远远落后于新闻实践，每天都感受到新闻改革实践的激励和鞭策。

1987年11月初，党的十三大闭幕，我不仅拥护和赞美集中了全党智慧结晶而形成的报告，而且要用这个报告中的思想来丰富和武装头脑，促进自己在研究和教学中，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贡献新成果。

新闻实践是新闻理论的源头活水。十三大的新闻报道实践，不论对新闻改革还是新闻理论研究，都是一次涵义丰富的示范——改革、开放、民主、透明。扎根于中国新闻实践

的土壤里，继承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革命传统、总结新闻改革的新鲜经验和批判地吸取外国新闻理论的合理成分，这三者有机结合的创造过程，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必由之路。

王 珏

1987年12月5日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精辟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文献	(1)
——为刘少奇同志《对华北记 者团的谈话》恢复名誉	
加强政策宣传的稳定性和预见性	(19)
政策宣传研究	(26)
力戒政策宣传的片面性	(44)
牢固确立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地位	(53)
新闻的“本质真实”的理论不应废弃	(62)
新闻报道失实例析	(73)
新闻广播是四化建设的思想中心	(79)
——兼论新闻工具的组织作用	
《新闻理论》专题讲授提纲	(94)
关于毛泽东“全党办报”新闻思想的研究	(125)
马克思和无产阶级报刊的党性	(136)
研究、宣传和实践共产主义的伟大典范	(149)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为了群众 宣传群众 组织群众	(159)
——学习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笔记	
试论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	(169)
理论上迷误 实践上有害	(186)
——浅议“人民性高于党性”的错误观点	

努力开创新闻学理论建设的新局面	(196)
论新闻典型 (上)	(207)
论新闻典型 (下)	(218)
略论新闻的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	(228)
恩格斯论党的机关报	(238)
报纸·广播·电视	(248)
对首卷《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纂大纲的 说明 (摘要)	(254)
——在1985年12月16日首届年会上的发言	
新闻自由与西方思潮	(262)
日本高等文科教育一瞥	(274)
广播电视与思想观念的更新	(279)
努力提高质量,全面忠实地记录中国广播电视 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290)
——在《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第二届年会上的发言	
新闻自由篇 (上)	(311)
新闻自由篇 (下)	(326)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339)
“合理想象”并不合理	(346)

精辟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文献

——为刘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恢复名誉

1948年秋，辽沈战役已经开始，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完全陷入被动的防御态势，人民解放军正处在全面的反攻的地位。蒋介石的反革命战车已经开向覆灭的道路。新中国即将在胜利的曙光中诞生。新闻工作面临着新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了从政治、思想、业务和干部队伍方面作好准备，迎接全国胜利后新闻事业大发展的局面，当时新华社同华北《人民日报》集合了一批记者，组成华北记者团，在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集训。10月2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以下简称《刘谈话》）。

《刘谈话》精辟深刻地论述了新华社、报纸和广播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 and 作用，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任务，党的领导机关、党报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以及人民记者的基本条件和修养等重要理论问题。《刘谈话》问世以后，受到广大新闻工作者的重视和欢迎，把它当作学习新闻理论的好教材，加强记者编辑党性锻炼和业务修养的指南，做好新闻工作的座右铭。成千上万的新闻战士从它得到

教益，吸取了智慧和力量。它哺育了一代新闻工作者。文化大革命以前，《刘谈话》在培养我国无产阶级新闻队伍方面起的重要作用，是人所共知的。

可是，到了1967年，在林彪、“四人帮”严密控制的报纸上抛出了《把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新闻纲领拿来示众》的批判文章；1968年，陈伯达、姚文元又合伙炮制了《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出笼。这两篇黑文均采取斩头去尾、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等诬陷术，把《刘谈话》打成“反命修正主义的新闻纲领”，是同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以下简称《毛谈话》）相对抗的大毒草。这实在是“人妖颠倒是非淆”。现在，应当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为《刘谈话》恢复名誉，还它本来的面目。

为读者服务，被林彪、“四人帮”诬蔑为贩卖资产阶级的“社会需要”论，这也是他们集中火力攻击《刘谈话》的“中心口号”。他们振振有词地质问：读者是划分为阶级的，为读者服务，不管什么读者，他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岂不是“明目张胆地抹煞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吗”？报纸要为读者服务，听取读者的意见和要求，研究读者的心理和需要，便是鼓吹超阶级的“社会需要”论，这种推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如果这种望文生义的荒唐逻辑能够成立的话，那末，列宁提出报纸上要有更多来自读者的声音，编辑部要经常了解报纸的宣传效果，反对“作者写写，读者读读”的作法，毛泽东同志指出办好一张报纸“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

对象”，他们岂不是也可以强词夺理地质问：不管什么读者、什么人、什么对象吗？这里并没有说“革命的”读者、“无产阶级的”人、“工农兵”对象，岂不是也可以定上“明目张胆地抹煞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的罪名吗？

依照时间、地点、条件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ABC。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报纸为读者服务的阶级实质截然不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大都集中在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在那里讲“为读者服务”，就主要是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为了掩盖资本主义新闻事业反动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用虚伪的“社会需要”论（现在美国的新闻理论又把它改成“社会责任”论），把一个阶级的私利拿来冒充全民的利益，把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说成是各个阶级的需要，把对垄断资产阶级负责歪曲成对整个社会负责。而《刘谈话》中说的“为读者服务”，不言而喻，指的是为解放区的干部和群众服务，为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刘谈话》虽然没有用“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这样的词句，但是通篇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阐述问题的。它指出：你们不是替资产阶级办报，而是给人民办报，是人民的记者、通讯员。我们所说的和人民联系，指的是和劳动人民的联系。在交通邮政不便的条件下，中央主要是依靠新华社、报纸、广播指导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工作。这些论述难道不能包含“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的内容吗？《刘谈话》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的，就会象安泰一样地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呢！这就寓意深刻地说明，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的是共产

党赖以生存和强大有力的基础。共产党领导的报纸也是这样。脱离群众，不能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齐爱憎，绝对谈不上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如果不是费尽心机地去搜寻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证据”，而是从整体上去理解《刘谈话》的精神实质，“抹煞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的罪名不是彻头彻尾的诬陷又是什么呢？

恰恰相反，《刘谈话》提出“为读者服务”，要求新闻工作者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正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宗旨和根本出发点。少奇同志说：你我是为读者服务的，为看报的人服务。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作好了。看报的人从你们那里得到材料，得到经验，得到教训，得到指导，你们的工作就作好了。又说：读者就是你们的主人，他说你们的工作没有做好，那就等于上级说的。这些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真理光芒的深刻论述，说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宣传工作的社会效果，是检验报纸办得好坏的最高标准。这同列宁的办报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列宁十分强调办报要有强烈读者观念，非常重视读者对报纸的意见，要求读者特别是党员和工人群众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对文章的要求，作出自己对报纸的评价。他说，不这样做，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就一文不值，因而也就不配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

林彪、“四人帮”一口咬定《刘谈话》反对毛泽东思想。确凿的证据，就是它“绝口不谈报纸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而要记者去考察党的政策，“煽动记者‘怀疑’党的政策”，在说到列宁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时，“一句也不敢引用”列宁讲的报纸要

“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这些“最最高举”的人看来，这是居心险恶的。其实，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称述毛泽东思想的正是刘少奇同志，是他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集中统一的党，虽然经历过几次反对“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但是党始终没有分裂。党的路线是党中央集中全党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制定出来的，在过去党的文件中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一般不用党的领袖和职务、名字来命名党的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提法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普遍运用的。在《刘谈话》发表的年代，当时还没有人发明“不提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反革命”这种公式。那时谈话和写文章，只要求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用不着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不会因此而有“反革命”的嫌疑。这是历史事实，不容抹煞。不提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反对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吗？这样说，岂非荒谬绝伦。《刘谈话》虽然没有直接用“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但整个谈话贯穿了新闻工作者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精神。少奇同志说：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足怕。我们根据马列主义的方法分析的结果，知道他们要死亡的。无产阶级硬是要发展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从总的方面来说的。但是，我们就是怕脱离群众。因此，我们要到处宣传这一点，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宣传这一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要和群众密切联系，而且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这种联

系。《刘谈话》要求新闻工作者和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宣传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宣传紧紧地依靠人民的力量，去打倒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同列宁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所说的“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列宁选集》第4卷第309页）在实质上有什么不同呢？不提“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就是“极力阉割列宁的思想，其目的就是反对党报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按照这种奇谈怪论，同《刘谈话》同年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谈话》等许多重要著作，岂不是都要受到株连了吗？

不错，《刘谈话》十分鲜明地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求记者担负起考察党的政策的任务。这在戴着“顶峰”论、“天才”论眼镜的“四人帮”看来，是“罪该万死”的。他们说，毛主席在《谈话》中强调“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而在半年之后，《刘谈话》居然提出要记者“考察党的政策正确不正确”，这完全是对抗毛主席的办报思想。他们歪曲《刘谈话》的正确观点，把它说成是对《毛谈话》的影射、贬低和对抗，把报纸宣传党的政策同考察党的政策对立起来，想方设法把《刘谈话》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对立面。而实际上，少奇同志的《谈话》同毛主席的《谈话》一样，都是运用马列主义正确地总结了当时新闻战线上开展反右反“左”的历史经验，精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

党、报纸和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等重大原则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宝贵财富，指导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重要文献。

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着重论述了正确地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党报所担负的重大任务。《毛谈话》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党通过报纸的宣传，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就会产生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同时，它还指出，要正确地宣传党的政策，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必须从实际出发，考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要求，报社的同志要轮流下去参加群众工作，向群众学习，经常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这些深刻论述说明，报纸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是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工具。

刘少奇同志在《谈话》中着重从另一个侧面论述了党的领导机关、报纸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指出：列宁说，党要经过千百条线索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报纸通讯社，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是千百条线索中最重要的一個，它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又说：人民也是依靠你们的……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给新华社，给各级党委，给中央，给毛主席，这就联系起来了。这里说得很明白，报纸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既要上情下达，把党的方针政策传播

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的实际斗争，又要下情上达，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愿望、情绪和要求，帮助党的领导机关及时了解各种情况。

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检验党的政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因此，报纸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而且要了解 and 反映党的各种政策在群众中执行的情况。无产阶级政党也难免会犯错误。当党在政策指导上发生错误时，报纸宣传了这种错误的东西，就会在不同程度上脱离群众，危害人民的利益。避免和克服这种情况的根本办法，就是紧密地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刘谈话》明确指出：党的政策在群众实践中受到考验。你们有责任考察党的政策执行的结果，及时向党反映，中央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改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全起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有材料作根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有材料作根据。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当然，有的是不必要发表的。这就是说，报纸作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应该能够帮助党循环不已地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党的各种政策，坚持正确的，纠正错误的，补充修改不完善的，废除过了时的，又把集中起来的意见向群众作宣传，在群众中坚持下去。

根据《刘谈话》的这些要求，报纸宣传党的政策，不能只是简单地搜集一些材料和事实来证明政策的正确，而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政策在群众中执行的情况。记者不仅要看到执行政策取得成绩和效果的一面，也要看到坏的一面，不仅要看到群众拥护的一面，也要看到群众怀疑或反对的一面。还要运用马列主义对各种情况作出自己的判断，一个政策下去，

要看是什么人拥护，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怀疑。如果应该拥护的人反对起来了，就要看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是执行中的问题。这样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反映事物，才能使得党和人民了解真实的情况，正确地掌握和执行政策。只有正确地反映实际，才能正确地指导实际。要求记者考察党的政策，正是为了正确地宣传贯彻党的政策。也正是在坚持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这个意义上，少奇同志向记者提出了考察党的政策的任务。他还说：记者如果能够经常真实地、全面地、深刻地把群众的情绪反映出来，把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反映出来，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了路了。因此，要求记者考察政策就是“煽动记者怀疑党的政策”，纯属无稽之谈。《刘谈话》绝不是什么针锋相对地同毛主席的办报思想相对抗，而是对毛泽东思想这个集体智慧结晶的补充、丰富和发展。

“反对群众办报，主张专家办报”，是林彪、“四人帮”加罪于《刘谈话》的第三顶帽子。少奇同志讲了这样一段话：在整个社会中，有你们的特殊职务，别人做不好、不能做的，有专门的人，不做别的事情，或少做别的事情，专门做这件事情。因为社会上有此必要，因为人民有这个需要。这些话经过他们的显微镜检查之后，被认定是“修正主义”言论。说记者是“特殊职务”，就是鼓吹记者有高人一等的特殊地位吗？不是，丝毫也不是这种意思。少奇同志讲这段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在华北记者团集训的同志中，有些是刚到解放区参加新闻工作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新闻工作不熟悉，没有兴趣，担心是不是有前途。《刘谈话》强调了新闻工作的重要性，教育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不要“自己相